

陈剑雨

文集

①上

《 》
电影文学
剧本选

陈剑雨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陈剑雨 文集

①上

影文学
本选

陈剑雨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一桌、一椅、一书架，外加
一小床，和平里的单身汉。





◆ 1988年与张艺谋。







◆ 1996年与日本剧作家、导演新藤兼人先生。他的电影《红高粱》《鬼婆》曾在电影《红高粱》最初酝酿之时，被张艺谋、陈剑雨、朱伟反复观看。





◆ 陈剑雨爱海，是他血液里浪漫的部分

序

良师益友话剑雨



米家山

无论以什么名义和理由，我都不配给《陈剑雨文集》作“序”，我是剑雨先生的学生，又无甚大作为。但向前老师及其亲朋好友的盛情难却，我只能勉为其难，斗胆拙笔了。

第一次和剑雨先生见面，是1989年3月。先生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率内地电影人参加第十三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我是团员。我的导演电影处女作《顽主》，有幸被列为这届电影节开幕式放映影片。

对先生，之前早有所闻。印象很深的是先生所写的影评。那时的电影刊物很多，仅中国影协就出版有《电影艺术》、《世界电影》、《大众电影》等三四种，专业性和学术性都很强，远不像如今这样娱乐八卦，这对于当时我们那些跃跃欲试、想当导演的青年来说，都是重要的学习资料。记得

先生1983年所写的关于影片《人到中年》的影评:《从文学典型到银幕典型——陆文婷和“马列主义老太太”从小说到电影的比较研究》,一出来就引起广泛关注,一万五千多字的理论探讨,热情而严谨。我记得还帮潘虹剪贴下来,作为她总结和调整自己创作的参考。记忆中,那时先生是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一个极其敏锐而专业的影评家。

在这次电影代表团名单上,我看到先生的身份,是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黝黑、壮实、沉稳、谦和,是我对先生的第一印象。在整个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先生如长者般关照着每个团员的饮食起居、参会、观影,其细心和体贴,使我备感亲近。

那年,我为了峨眉电影制片厂能同意我拍摄影片《顽主》,曾与厂里签下导演承包合同,即如果完不成50%的利润率,就停止工作并停发工资两年。结果影片花了80万,发行拷贝收入只有110多万。由于没达到50%的利润,我主动接受了这个必须面对的处罚。一次聊天中,先生知道了这个情况,立即对我说,你到福影厂来吧,我跟峨影厂联系,正式邀请你来福建拍片,你先拍一部能赚钱的商业片,然后再拍一部你自己想拍的影片。这对于当时正面临没有工作的我来说,无疑是济困解围、雪中送炭,惊喜中,我在被先生的侠义和豪爽深深感动的同时,心里也暗暗钦佩先生的清醒,因为随着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原本风风光光的电影业已开始萧条,产业化转型暗潮涌动、势在必行,先生让我先拍一部商业片,是为企业发展着想,而让我拍一部自己想拍的片子,则是对电影艺术和电影导演追求的尊重。

先生的承诺很快落实。两个月后,我已经来到厦门鼓浪屿。先生把我安排在这个美丽幽静的小岛上,开始每天和我一起策划两部影片的剧本。

先生一点不像厂长,他更像一个文人,或者朋友,平易近人的探讨和精准专业的判断,使两个题材很快敲定下来。话语间,先生引经据典、寻章

摘句，但又不古板，不深沉。两部影片的剧本创作、修改和筹备，很快完成。悬疑警匪类型的《袁氏遗产案》定在鼓浪屿拍摄，社会问题类型的《你没有十六岁》定在泉州拍摄。

先生是闽南泉州人，50年代末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生对故乡泉州和厦门的爱，无疑源于他对童年和大学生活的怀念。在我后来的记忆中，先生几乎每年都要回泉州、厦门数次，这种超乎寻常的对故乡的深邃之情，在我一生认识的人中，先生可谓罕见的唯一。

《袁氏遗产案》的拍摄和后期制作非常顺利，很快通过审查并公映，影片为福影厂带来不少的利润，这使得《你没有十六岁》也得以顺利开机。在两部影片的拍摄中，先生作为厂长，从剧本到摄制，事无巨细，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呵护，极少干预。但《你没有十六岁》因为揭露社会问题、触及敏感时弊，不仅省里宣传部审查没通过，还给先生带来不少麻烦，至今让我深感内疚。但先生似乎早有预料，他据理力争，沉稳应对，毅然担当。其实我早就意识到，他从一开始就是“同谋”。《你没有十六岁》最终还是被封杀，但两部影片后，先生和我的关系，愈渐深浓，先生成了我的恩师益友。

五年后的1994年，我再度与先生合作，拍摄了先生创作的剧本《带轱辘的摇篮》，因为是主旋律，这次合作很顺利，也很愉快，影片成功地获得了第三届长春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也就在五年后，电影局出人意料地把《你没有十六岁》“追审”通过了。我至今记得，在峨影厂标放间看完虽被删减得残缺不全但勉强通过的《你没有十六岁》后，先生紧紧抓住我的手说：“一部好影片，可惜了。”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先生两眼噙满眼泪……一个月后，《你没有十六岁》获得“中国电影文汇奖”十大国产片奖，榜列第一。此刻，我进一步认识到先生是最谙熟艺术创作又通晓体制规则的性格中人。

先生在50年代末大学毕业后，先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事民间文学

的编辑、研究工作。“文革”后，调入中国影协办的刊物《人民电影》杂志工作，开始了对电影艺术的研究。

十年浩劫过去，百废待兴。先生从电影创作理论入手，很快步入自己的电影之路。先生凭借扎实的文艺理论功底和极其独特的艺术感觉，很快进入电影。敏锐、思考、勤奋、严谨，开始不断发表各种影评和随感，有时为写好一篇理论探讨或评论文章，常通宵达旦，连续熬好几夜。功夫不负有心人，先生的文章渐渐引起业界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随后，先生开始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电影中的人性和人情》、《从文学典型到银幕典型——陆文婷和“马列主义老太太”从小说到电影的比较研究》、《艺术地再现生活中的矛盾状态——评〈邻居〉》、《引人遐想的黑炮事件》、《历史的穿透力及其他——对于〈天云山传奇〉的再认识》等等，敢于触及敏感话题，切中要害，言之有物，成为先生影评的特点，对当时的电影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如1982年，先生看了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动画片《三个和尚》后，兴奋不已，熬夜写出近两万字的《从三句话到一部影片——评动画片〈三个和尚〉》，作为论述中国动画片的专著，至今无人超越。

从电影理论研究入门的先生，很快意识到，剧本乃一剧之本。电影文学是电影创作的根基，要改变中国电影现状，必须解放思想，先从题材选择和剧本创作入手。先生开始向电影文学剧本创作探索。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群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年轻电影人，开始崛起，他们经受了十年浩劫的磨难，又在改革开放后接受了专业训练，他们带着强烈的改变中国电影的激情进入电影界，他们敏锐，他们思考，他们张扬，他们渴望，他们想打破陈腐守旧的电影模式，在银幕上用自己的电影语言来展示和宣泄他们生活的经历、感受和生活。标新立异，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电影《一个和八个》、《黄土地》诞生，给沉闷而传统的中国电影带来了第一波新浪潮。

作为电影剧作家的先生，就在这个适时的时候，杀了出来，他敏锐地发现并执笔改编出了电影文学剧本《红高粱》，这对于新时期中国电影、特别是第五代导演的创作，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1986年春，先生读到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校样，《红高粱》这部宏大的关于中国农民的“野史化”家族叙事，其惊世骇俗的爱情传奇和野史传说，形成了对现代中国历史权威叙事的颠覆。先生凭借长期对中国电影理论研究和正在崛起的第五代导演的关注，立即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能改编成好电影的作品。

先生立即把小说推荐给了已经初展才华、他认定能成为好导演的张艺谋，两人一拍即合。先生又主动提出邀请该小说责任编辑朱伟，并联络莫言一起改编，由先生执笔，根据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红高粱》、《高粱酒》两个中篇，改编出了电影文学剧本《红高粱》。张艺谋用全新而震撼的电影语言，创作出电影《红高粱》，一炮打响，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第一部获得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的国产电影。第五代导演正式进入创作的巅峰。

对于电影《红高粱》的成功，先生对其题材的发现、从小说到电影文学的二度创作以及执笔剧本，并未获得业界的足够认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理论和创作都无法阻止先生对电影的钟情，先生开始又向电影事业家跨越。

1988年夏，由福建省委宣传部与中国影协协商，经国家电影局和中国影协批准，先生被借调到福建电影制片厂任厂长。先生在实践中学，强化制片生产管理，健全机构，完善制度，发现并引进优秀人才，在电影生产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艺术创作人员与生产制片人员素质，用短短两年时间，就把福影厂的生产引入正规，先后重点拍摄了故事片《欢乐英雄》、《阴

阳界》、《袁氏遗产案》、《你没有十六岁》等影片。其中吴子牛导演的《欢乐英雄》、《阴阳界》获得了第九届中国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配角奖等多项奖，开创了福建电影制片厂的历史新局面。

中国电影金鸡奖的创办和健全，也与先生的努力密不可分。

1981年初，中国电影家协会决定设立一个专业性评奖，由专家来评选各片种的优秀影片和优秀创作人员，从而与群众性的“百花奖”互为补充，以便更全面、准确地反映电影创作的成绩，促进电影的繁荣发展。

先生受命接手中国电影金鸡奖的创办和筹备，并挑起了负责实际工作的副组长重任。先生通过大量调研、组织和协调，用极短时间写出《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奖条例》，设计出评奖程序，使第一届“金鸡奖”评选于当年4月在杭州如期举行。先生还承担了从第一届金鸡奖开始大部分获奖奖项以及连续几届的评语及评选侧记等文字工作。

电影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艺术和一项最现代的文化产业，其生产中的各个创作环节和制作工种，几乎涵盖了生活本身的所有手艺和行当，但先生通过不懈的努力，竟然能兼其理论研究、剧本创作和生产管理于一身，不得不使我对先生油然而生敬意。先生执着而倔强，踏实而低调，默默地近乎于固执地坚守着他对电影的那份爱，就如同他对故乡泉州的那份深情一样。

2008年，先生悄然仙逝，一如他平日里干净利落的行事风格。从发现晚期癌症到走，仅仅两个多月时间，让所有爱他的人和爱他的人都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先生要家属不要把他的病情告诉任何亲朋好友，他要默默地走，如同他默默地献身于他钟爱一生的电影。

生命存在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最精彩、最华美、最璀璨的是燃烧。

先生选择了燃烧。直到发现绝症前，先生仍在电影之路上奔跑。

我对所有用燃烧方式完成生命历程的人，都发自内心真诚的崇尚和敬畏。

在先生走后的近六年时间里，向前老师渐渐从丧夫之痛的沉重打击中振作起来，拖着柔弱病患的身躯，开始慢慢收集、整理先生的遗物。先生留下最多的就是文字，那些在夜深人静里独自伏案所写下的思考，这几乎就是他全部的精神世界。但要把这些散落在浩瀚如烟的各种报刊中、数以百万计的文字收集起来，这是何等繁复而艰巨的工作。向前老师用顽强的毅力，完成了100多万字文稿的收集整理，并选编成册。

一个女性，如果没有宽厚的爱、强烈的责任和坚忍的毅力，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最后，我还想提及先生的两个孩子：向京和向华。女儿向京，以其独特而大胆的雕塑语言，极富震撼地挑战传统的视觉观念，塑造了一系列直面人性的女性艺术形象，成为中国当代最前卫、最重要的雕塑艺术家。儿子向华，更多地承袭先生早年的文学素养，用纯真的童心和勤奋的脚步，参与创作出《宝莲灯》、《我为歌狂》这样的动画片佳作，并在儿童艺术教育和绘本书方面默默耕耘，留下了一个个踏实的印记。两个孩子在各自喜爱的艺术中的成长和成功，无疑深受其父亲的艺术天赋和性格影响。两个孩子，也是他生命中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从两个孩子身上，我看到了先生对艺术的那份执着，及倔强而坚定的背影。